

郑成功研究文集

主编 洪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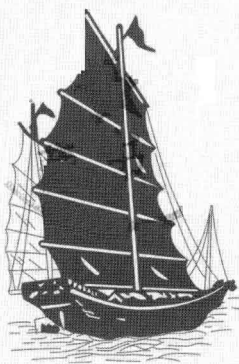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郑成功研究文集

主编 洪本地



南安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50周年暨第二届郑成功文化旅游节筹委会
福建省南安市郑成功研究会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成功研究文集/洪本地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615-4263-7

I. ①郑… II. ①洪… III. ①郑成功(1624~1662)-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190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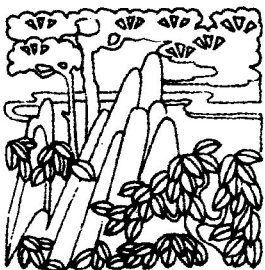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66 千字 印数:1~4 000 册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50周年暨
第二届郑成功文化旅游节活动



序一

今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 350 周年，南安市在举办纪念活动的同时，举行学术研讨会，这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令人欣慰。

提到郑成功研究不能不让我想起 50 年前在厦门举办的“郑成功研究讨论会”。那是专门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00 周年而筹划的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主要负责人是我们的老师、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傅衣凌教授。会后编辑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直到 1965 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只有 250 册，因为那时已经到了“文革”的前夕了。改革开放以后，1982 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20 周年，又举办一次讨论会，仍然由傅衣凌老师主持，开始邀请外国学者与会，会后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论丛》与《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1987 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25 周年，则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与厦门台湾学会联合举办“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有美国、荷兰、日本学者参加，会后出版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此外，我们还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和《郑成功满文档案史实选辑》。330 周年和 340 周年在厦门、泉州、南安等地也举办研讨会，也都出版了论文集，350 周年则由南安市主办。

简单回顾 50 年的历程，是为了说明郑成功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前人创造的成果对后人来说，既是有利的条件，又加强了难度，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不断地拓宽加深，发掘新的



史料,探讨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才能取得更大的学术成果。

应当说,近年来郑成功学术研究有所削弱,大陆如此,台湾也如此。如果进行简单的检索,就会发现发表的学术论文为数甚少,而有关画像、铜像、形象、郑成功信仰、书法、旅游以及文化节的文章却占了相当大的份量。2010年在南安举办的郑成功学术研讨会出版的《郑成功论文集》可以算是最近的研究成果,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有关“郑成功与海洋”、“郑成功与文化”的研究。2012年举办的这次研讨会会有论文讨论郑芝龙集团的海商性格、郑成功1656—1657年的“海禁”以及荷兰与郑氏的贸易、郑氏的海权战略,也有讨论郑氏对台湾文化的影响等。由于未及阅读原作,无法置评,总的印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有所创新。

有些学者认为郑成功研究是一个老课题,很难有新的进展,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低水平的重复、“炒冷饭”的现象,或标新立异,写“翻案文章”,或以“联系实际”为名,以古喻今,让郑成功为一定的政治目的、经济利益效劳等。为了端正学风,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上述问题。对于“低水平的重复”,关键在于审稿者必须“把学术关”,不要轻易“放行”;对于“标新立异”,要看是否真有理,对于前人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但不能随心所欲,把“有”说成“无”,这往往是自己学问不够,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而以今天的政治标准来要求古人,批评郑成功“忠于南明”,批判郑经“搞台独”,则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郑成功是郑成功时代的郑成功,不要把他“现代化”,不要强迫他“为现实服务”。因此,在当前的条件下,审视既有的研究成果,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有针对性地写出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可能是郑成功研究可以取得新的进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祝愿郑成功学术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陈孔立

2012年3月

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序二

放眼数千年，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很少有人像郑成功那样具有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意义。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郑成功完全地实践了“忠”的伦理原则，当清廷将他父亲郑芝龙软禁京城，作为人质胁迫他归顺时，郑成功亲自手书致函父亲，表明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能选择做大明忠臣的坚定意愿。这种选择是非常痛苦的，必须克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世俗价值观，超越常人亲情的局限，从而以“抗清复明”的政治实践艰难地完成了伦理信仰赋予他的使命，尽管在政治上以失败告终。

历史发展过程不断产生的丰富社会内容以及价值取向，也在后来赋予了郑成功新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遭受西方侵略，遭受割地赔款的屈辱，从而触发了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的觉醒，郑成功“驱荷复台”击败外部入侵为他赢得了爱国主义的历史荣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运动遭到清算，亚洲、非洲、中东地区各国各民族人民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当人们将反帝反殖意识投射到历史中时，郑成功又具有了东方最早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色彩，并在整个亚洲范围内获得崭新的光环。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在上个世纪末越来越明显，当我们的视野超越历史“中时段”范围，便会发现在西方进行殖民运动时，世界



范围的经济体系作为附带物也在形成过程中,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世界收获了这个由世界各民族数百年苦难浇灌出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硕果,而郑成功和明末清初的东南海上贸易集团则最早地在东亚地区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最初的形成。他是参与过程中最成功的一个。因此,郑成功获得了世界经济体系最初参与者的身份。

如果人们考察一下西方海军诞生于海上贸易及其保护贸易的天然属性,就会发现海军是海洋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在海洋上的自然延伸物。通过对比也会看到:中国自古以来的水师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而非以海上贸易作后盾,因此中国水师虽可声势浩大于一时,但不能持久于长远。在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水师舰队中,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水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航海贸易为主要基础成份、具有地中海文明色彩和西方意义上的海军。

西方学者威廉·麦克尼尔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是“商业——军事复合体”,它起源于中世纪庄园经济时期的武装商贩,以后逐渐发展壮大到出现商业城镇,逐步取代了落后的庄园经济而膨胀为国家形态。由于海上贸易的资金成本和安全成本大大低于陆上,于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军事复合体”最先从欧洲海岸地区发展起来,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扩张。并先后诞生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海上强国。这些海上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国家运作的特点是经济、外交、军事三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相互扩张,运作成功者乃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魁首。中国学者顾准亦以其独到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若是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以此而论,中国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以江南丝织业为代表的观点颇显缺憾,而郑成功海上集团“商业——军事复合体”的性质使之成为无可争辩的中国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

西方的价值观之一是“自由”,而贸易自由是自由这一神圣而抽象的概念实实在在体现于世俗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形式。郑成功

等东南海商们成为不自觉地中国农耕社会中的实践者。中国当下刚刚步入现代海洋国家的行列,在海洋实践方面尚未超出郑成功时代,海洋国家的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曾有过为自由贸易而战的经历。自古以来,中国经历过无数次战争,但从未以国家身份参与一场旨在贸易的战争,郑成功等海商们却以地域割据的政治军事角色投入过贸易性质的战争。历史的表象千变万化,但历史的法则一成不变,尽管我们来到了 21 世纪,我们的先人们这种独特的海洋贸易和海上军事实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随着世界进程的继续,我们还将在未来发现郑成功更多的文化意义。在郑成功收复台湾 350 周年之际,我们缅怀这位中国历史上多姿多彩、绝无仅有的伟大人物,对他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演进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世界文明转型之际率先突破农耕民族的藩篱、冲向海洋去迎接新时代曙光的伟大壮举表示崇高敬仰。

是为序。

倪乐雄

2012 年 3 月 16 日

于上海政法学院

目 录

请不要随意对郑成功进行“颠覆”	邓孔昭(1)	
郑荷较量:1656—1657 年郑成功海禁及其意义	杨彦杰(16)	
台南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及祭祀源由	郑道聪(26)	
郑芝龙的海洋精神	林仁川(37)	
郑成功遇风考	周翔鹤(49)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与现实意义	谢重光(61)	
郑成功妻子董友的女性生活史研究	林 星(67)	
郑成功与隐元禅师	胡沧泽(83)	
1622—1626 年荷兰开发台海贸易市场的困难与策略		
——以《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		
书信集 I》为研究依据	陈璚琦(90)	
“顺治被炮毙于厦门”之我见	何丙仲(106)	
揆一应负失守台湾最大责任		
——以《被忽略的台湾》甘为霖英文节译为据		
.....	吴贤俊(113)	
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与两岸和平发展	苏振芳(121)	
郑成功及其王朝对台湾文化的影响	谢贵文(130)	
从“延平条陈”到澎湖之战		
——郑氏集团的海权战略得失分析		倪乐雄(138)
郑氏集团与明末清初的沿海卫所		
——以高浦千户所为中心		蒋 楠(148)
对《郑成功夫人董氏身世考略》的一点补充	李天锡(157)	
关于厦门延平郡王祠的几点思考	陈 洋(165)	



两岸文化旅游景观中的郑成功	张水源(174)
论台湾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的必然性	
——从 17 世纪郑氏海商集团到《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	谈 谭(189)
郑成功延平受命收复台湾考略	陈利华(204)
日据时期台湾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论议	
.....	陈丹妮(214)
郑成功在闽北遗俗之传承和保护的一点思考	黄睦平(228)
日本人对郑成功想象的开端	苏文菁 黄 莺(238)
明代海盗的发展与国家能力建设研究	赵雅丹(256)
论泉州学人对郑成功的影响	庄林丽(267)
浅谈明末清初郑氏三代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陈义杰 陈乐怀(276)
《漳浦营里郑氏族谱》发现 郑成功远祖之谜破解	
.....	郑荣都(283)

附 录

成功故里情 两岸一家亲

——首届泉州·南安郑成功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	(288)
郑成功碑林建设概况	卓金钳(292)
郑成功入传《南安县志》之轶事	潘伟亚(295)
台南市隆重举办“2011 年郑成功文化节”	黄天助(302)
郑成功陵墓被盗后的整理与修复	伍天辉(307)
以郑成功历史功绩激励后人	
——略谈郑成功纪念馆积极发挥教育基地的作用	
.....	黄成专(310)
编后语	(314)

请不要随意对郑成功进行“颠覆”

邓孔昭

2011年11月18日傍晚，笔者收到陈孔立教授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以“小一”号大字显示：“今天《厦门晚报》A12版有一篇报道，对郑成功有‘颠覆性’的看法，请你看一看。”老师以前从来没有用如此大号的字给我发过邮件，说明他对此事十分重视。

师命难违，找来报纸一看，原来是记者写的一篇报导文章，题目是《郑成功有没有繁荣厦门经济——文史专家李启宇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供商榷》，其中报导了李启宇先生在一个“公益讲座”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李先生认为，过去史学界把郑成功神化了，有意隐藏了郑成功的一些短处。郑成功没有繁荣当时厦门的经济。那时，厦门每年都有战争，郑成功担心厦门的老百姓向清朝军队通风报信，做出了“空岛”的决定，命令岛上所有居民连同军队的家属全部迁出厦门岛。厦门百姓背井离乡，经济不可能繁荣。郑成功进攻南京时，他担心部队出发后，留在厦门岛上的家属会逃走，导致在前线打仗的兵士也当了逃兵，便规定所有的家属都必须上船，实际上是将家属当作人质。记者对李启宇先生论点的表述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也不知是李先生真有“雄心”颠覆以往人们对郑成功的评价，还是记者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故意用了这耸人听闻的“颠覆性的观点”这几个字。但根据这些表述，上述的一些论点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对郑成功的研究，包括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想要标新



立异不是不可以,实际上,现在史学界每天都有人在这样做。但是,要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像郑成功这样历史人物的评价进行“颠覆性”的翻案,那你就必须拿出过硬的论证和论述来。李先生是厦门史的专家,但对郑成功的研究却比较草率,而且论点中主观臆测的东西太多。

“郑成功有没有繁荣厦门经济”?过去,“厦门史学界”怎么论述,又怎么引起李先生的不同意,我们且不管它。但笔者认为,厦门自1650年成为郑成功的抗清基地之后,从之前并不知名的中左所成了思明州;郑成功的军队大量在此驻扎,数万人在此生活;郑成功海路“五大商”——仁、义、礼、智、信五大商行设在这里,每年从事海外贸易的利润就有一两百万两银子。这种人口的剧增和这种规模的商业活动,会给当时当地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经郑成功之后,厦门的地位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重视,把福建水师提督衙门设在这里,更是奠定了厦门以后的发展。如果有人要说,厦门的繁荣从郑成功时期开始,我认为也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李先生从战争时期经济不可能繁荣的角度来论述郑成功对当时厦门经济的影响,表面上看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没有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并且在主观上对郑成功还加上了一些没有根据的猜测,所以,他的结论就不可能客观。

李先生认为,“那个时期厦门每年都有战争”,可惜这并不是事实。从1650年郑成功把厦门作为抗清基地开始,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并去世为止,12年间,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当时对郑成功主要采取招降、待降的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厦门是个海岛,水师力量相对薄弱的清军无能为力,厦门有战事的时间并不多,一共只有3次。分别是:第一次,1651年农历闰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十七日间,清军总兵马得功趁郑成功率大军南下广东,偷袭厦门得手,随后被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围困,最后又被郑鸿逵放走。第

二次,1655年九月至1656年三月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领满汉官兵数万人准备对厦门、金门发动进攻,最后却在海上被大风打翻许多船只,失败而回。第三次,1660年四月至十月,清军乘郑成功在南京战败,调集数万兵马,由安南将军达素率领,再次对厦门地区发动进攻。五月,清军水师在金、厦海域被郑军打得大败。十月,清军最后撤离。从上述史实来看,这12年间,厦门有战事的年份只有4年,真正有战争或者有战争威胁的时间只有1年4个月。只有在厦门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候,郑成功才会要求官兵家眷和厦门的老百姓转移到较为安全的金门、浯屿、镇海等地。因此,厦门老百姓真正离乡背井的时间并不会太多。

李先生甚至说,“郑成功担心厦门的老百姓向清朝军队通风报信,做出了‘空岛’的决定”。这句话相当严重,如果郑成功地下有知,一定会认为是对他的诬蔑。郑成功确实在清朝军队威胁厦门时,多次要求官兵的眷属和百姓撤离厦门,避免他们受到清朝军队的祸害,因为他们有过教训。用郑成功的话说,1651年,清军偷袭厦门得手时,“虔刈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以胜计”。^[1]为了避免这种悲剧重演,郑成功才在厦门面临重大军事行动之前,要求“并空思明”。^[2]他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这些眷属和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着想。正像抗日战争时期,我抗日根据地每遇日本鬼子的“扫荡”,也会要求抗日军民进行“坚壁清野”,这样做,不是我八路军、新四军担心根据地的老百姓会向日本鬼子通风报信,而是为了避免根据地老百姓受到日本鬼子的祸害。这样浅显的道理,李先生应该懂,实在不应该给郑成功加上那种莫须有的罪名。

李先生还给郑成功加上了另外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他说,郑成功进攻南京时,“他担心部队出发后,留在厦门岛上的家属会逃走,导致在前线打仗的兵士也当了逃兵,便规定所有的家属都必须上船,实际上是将家属当作人质”。郑成功在北伐南京时,确实曾下



令“传谕官兵搬眷随征”。^[3]但是,郑成功决不是为了把官兵眷属当人质才这样做。试想,如果要把这些眷属当作人质,是把他们困在厦门便于看守,还是让他们在迢迢数千里的远征途中便于看守,这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答案的问题。郑成功之所以要让官兵眷属随征,主要是要解决官兵们的后顾之忧和对亲人的思念。据《先王实录》记载,1659年二月,郑成功在浙江磐石卫下令,“官兵远征,不无内顾,携眷偕行,自然乐从。本藩统领大师,北伐丑虏,肃靖中原,以建大业。虑各勋镇将领官兵,永镇之时有为家之念,已经着兵、户官拨赶舢船配载各眷,各令有眷官兵依照派船载来,暂住林门,候令随行”。这个命令下达之后,“时官兵俱各欣悦,惟女眷醉船,颇有怨言”。^[4]事实说明,当时官兵们十分拥护这一做法,丝毫也没有自己的眷属当了人质的感觉。倒是眷属们有些怨言,但主要是因为晕船。

通过上面所举的例子,就可以发现,李先生提出的一些对郑成功的“颠覆性的观点”,在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添加了太多的主观臆测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是无法“颠覆”人们以往对郑成功的评价的,但是,这个事情却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现在,社会上想“颠覆”这个、“颠覆”那个的人太多,有些东西,你要“颠覆”也就罢了,但郑成功是中华民族(特别是厦门)宝贵的文化资产,他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丰功伟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忠贞不屈的人格、他留在厦门的文物古迹,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维护的。笔者吁请各位有识之士:请不要随意对郑成功进行“颠覆”。实际上,真正美好的东西,你是丑化不了的,更是“颠覆”不了的。

二

在写了上述的文字之后,笔者在11月24日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厦门日报》。因为笔者希望,《厦门晚报》的文章产生的影响,能够在同样读者群中得到澄清。经过了近1个月的时间,《厦门日

报》在2011年12月20日的27版以《请勿随意“颠覆”郑成功》为题，登载了经报纸编辑“斧正”的约700字文章的“精简版”，口气十分的“温和”，很多的论述和观点都被删除了。即便是以这种面目出现，能够刊出已经很不容易了。期间，因没有及时得到文章是否能够刊出的消息，笔者曾经通过“关系”了解文章的命运，并表明如果《厦门日报》明确不能刊出，将改投厦门的其他报纸以求刊出。笔者之所以这么在乎这篇小文章的刊出，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作为一个在厦门生活了数十年并且从事郑成功研究的学者，不能容忍有人给郑成功泼了污水，而没有得到任何的洗刷。这么小小的一篇文章刊出之后，笔者得到了一些读者的支持，有人当面表扬文章写得好（笔者心里苦笑），有人打电话表示同仇敌忾，也有人劝我不要去写这种帮助别人炒作的东西。这些朋友的支持使笔者感到欣慰：真正了解郑成功的人们对他的崇敬是一如既往的。但笔者还是担心，那些不了解郑成功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由“快餐文化”喂食长大的年轻人，会不会受到这种“颠覆”文化的影响。

12月27日，《厦门日报》的35版又发表了李启宇先生的《郑成功繁荣厦门经济？——答邓孔昭院长》一文，全文大约1100余字。文章认为笔者对他的观点有误解，因此从六个方面进行“澄清”。文中的口气十分“客气”，照理，笔者应当适可而止，不再深究。但一个朋友在电话中的一番义愤又感染了笔者：有人自己在“忽悠”读者，却大言不惭地说别人在神化郑成功、“忽悠”老百姓；自己在利用编辑以及一些读者的历史知识不够，企图把水搅浑，却又正词严地说要“澄清”历史事实，这太可怕了。朋友的提醒，使笔者感到有责任再写一些东西以正视听。特别让笔者感到有再写冲动的是，笔者有两位其他专业的同事居然也被李先生“忽悠”了，完全看不出他的文章有什么问题。笔者知道，在如今“颠覆”、“戏说”、“八卦”盛行的年代，真正历史的真实，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事实也证明，厦门的一些媒体对李先生的观点也更加青睐，不知道是不是在“忽悠”自己。笔者确实感到了一种神圣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人们高喊要促进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即使难以在拥有更多读者的媒体上发出声音,但笔者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学术领域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趁郑成功收复台湾 350 周年要召开学术研讨会之机,对李先生的“澄清”进行一些再“澄清”。

1. 李先生说:“颠覆‘郑成功繁荣厦门经济’与‘颠覆郑成功’是不同的概念”,意即他只想颠覆“郑成功繁荣厦门经济”这种说法,并没有企图颠覆对郑成功的评价。可惜,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前面已经说过,李先生不但认为郑成功没有繁荣厦门的经济,而且,还说郑成功是一个由于害怕老百姓向敌人通风报信,命令岛上所有居民连同军队的家属全部迁出厦门岛,致使厦门百姓背井离乡的人;还是一个担心部属的家属会逃走,可能造成部属当逃兵,便让部属的家属随军,实际上是将部属的家属当作人质的人。这样一种从人格上根本否定郑成功的说法,不是“颠覆郑成功”又是什么!如果郑成功真是这样一个不相信自己的老百姓、不相信自己的部属,甚至对他们如此居心不良的人物,他还能成就那么一番伟大的事业,还有资格成为民族英雄吗?我们的听众和读者,如果听信了李先生对郑成功的评价,就一定会感到,原来从小听到的“民族英雄”竟然是这样一个心理阴暗的人物,那么,对这些听众和读者造成的影响,岂止是对郑成功的颠覆!甚至可能造成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和他们整个世界观的颠覆!

李先生提出了“郑成功有没有繁荣厦门经济”这样一个命题,其实,了解郑成功研究学术史或有些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打个比方,如果有人提出“抗日战争有没有繁荣中国的经济”?这样的命题有意义吗?郑成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和影响,不是 300 多年前厦门的经济是否繁荣可以相提并论的,就好像抗战时期中国经济不可能繁荣,但抗战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否定一样。即使郑成功时期厦门的经济没有繁荣,也丝毫不能影响人们对郑成功的评价。事实上,根据笔者的了解,从来就没有学者专门以“郑成功繁荣厦门的经济”为主要观点发表过文章,最多只